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周年

1841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清朝被迫割讓香港島，18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清政府被迫讓南九龍。清政府經過鴉片戰爭的失敗，在 19 世紀六七十年代掀起洋務運動，企圖謀求自強革新，學習西方，特別希望在軍事技術層面與歐美看齊，於是展開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是清後期至清末時，清廷洋務派官員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發展基礎，在全國展開的工業運動。「師夷之長技以自強」和「師夷之長技以求富」分別是前期與後期的運動口號和目標。

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首次大規模的全國性西方工業運動，它是在封建皇權的背景下發生的。1866 年左宗棠在福州馬尾首創、沈葆貞接辦的船政局，可謂洋務運動的最大產物，形成近代中國最早的造船工業。1866 年成立的福州船政局，設馬尾造船廠和船政學堂。1888 年建立起北洋艦隊。

然而，片面的自強並未能使中國走向富強，清室權貴派系互相制肘，內鬥不斷，人民困苦日益深重。以李鴻章為首的一批權臣昧於形勢，對外屈辱妥協，軍備廢弛，從宮廷朝廷到地方權貴，各懷心事，相互猜疑，內部一盤散沙，各種矛盾錯綜複雜，進一給予外敵可乘之機。

1854 年美國軍艦兵臨江戶，打開日本大門，日本進入明治維新時代。與此同時，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日趨強盛，以明治天皇為首的統治集團密謀對外擴張。1887 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清國征討策略」，逐漸演化為以侵略中國為重心的「大陸政策」，第一步首先侵略琉球，進而吞併朝鮮、台灣及澎湖列島，並以朝鮮為跳板，進攻中國東北。

1894 年 7 月，甲午戰爭爆發時，中國在朝鮮的軍隊不到二萬人，日本軍隊卻在四萬人以上。9 月中旬，日軍進攻平壤，中國軍隊大敗，總兵左寶貴戰死，統帥葉志超下令撤退。平壤戰役後兩日，中國北洋海軍與日本艦隊在黃海海戰，雙方參加的軍艦各十二艘，交戰四小時，中國軍艦大敗，有四艘沉沒，致遠艦管帶鄧世昌等壯烈犧牲，日本亦有四艘軍艦受重創。北洋艦隊休整後，退守威海衛。

1895 年 4 月 17 日，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主要有下列數條：中國確認朝鮮國為獨立自主國家，朝鮮對清國的朝貢 奉獻、典禮永遠廢止。下列地方之城壘、兵器製造所及國有物永遠讓與日本。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群島，清國支付日本賠款 2 億兩白銀。《馬關條約》簽署後六天，俄、法、德三國對日施壓，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予中國。而日本要清朝再交付三千萬兩白銀，作為歸還遼東半島的費用。

甲午戰爭改變了東亞政局，大大助長了日本進一步對外侵略的野心。中國慘敗於日本，此後幾十年間國際地位一落千丈。日本在甲午中日戰爭前後一共勒索了中國兩億三千萬兩巨額白銀。《馬關條約》使日本獲得巨大利益，刺激其侵略野心；使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馬關條約所規定的賠款，為當時日本國家預算 8,000 萬日元的 4 倍強，相當於 3 億 6,000 萬日元以上的銀兩。日本以賠款作為財源完成金本位制度。

賠款的支付造成中國更貧乏。藉由獲取台灣稻米、茶葉、樟腦、蔗糖、林業開發，日本內地獲得了資本主義所需的資本運作，使日本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從邊陲晉升到半邊陲國家。該條約適應了帝國主義列強對華資本輸出的需要，隨後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1927 年 7 月，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宣布 8 條「對華綱要」，發表《田中奏摺》，認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930 年，日本經濟受到世界經濟危機拖累陷於低迷，冀望通過戰爭尋找出路，大舉侵華方案如箭在弦。

張作霖，東北奉系軍閥，掌握東三省軍政，因拒絕滿足日本提出在中國東北的特權，被日本視為眼中釘。1928 年 6 月 4 日，乘坐專列火車經過京奉、南滿鐵路交叉的皇姑屯站三孔橋時，被日軍預埋炸藥炸死。其子張學良集國仇家恨於一身，決心承認南京國民政府，正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宣告停戰，東北易幟，實現國家統一。

“九一八”事變：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關東軍誣衊中國炸毀柳條湖附近一段南滿鐵路，日軍突襲東北北大營及瀋陽，策動「九一八」事變。當時東北軍將領接到身在北平的張學良奉行蔣介石「不抵抗」命令，翌晨全城陷落。日軍在一周之內，迅速佔領遼寧、吉林兩省大部分地區。隨後佔領東北三省。1932 年 2 月，東北三省全部淪陷。「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企圖大舉吞併中國的重要序幕。

面對日本步步進犯，蔣介石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東北淪陷，華北岌岌可危，日本為減輕國際社會對入侵東北的壓力，轉移國際輿論視線。1932 年 12 月 8 日悍然對上海發動攻擊，揚言 4 小時內攻陷上海。駐防閘北的中國十九路軍在蔡廷鍇、蔣光鼐指揮下英勇迎敵，遏制了日軍侵略攻勢。後稱為「一二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號召和領導了東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和游擊戰爭，和 1935 年北平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當時廣東省的中國青年同盟、中山大學救亡協會、餘閒樂社等進步團體先後成立，曾生、在“日本皇后”號郵輪上當海員，組織愛國海員，籌辦“餘閒樂社”，宣傳抗日。後任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而王作堯、楊康華積極參加和發起廣州市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並相繼加入中國共產黨。

西安事變：「一二八」事變後，在國家危亡關頭，張學良、楊虎城在 1936 年 12 月策動「西安事變」，在共產黨的斡旋下，最終促成國共兩黨合作，團結各方一致抗擊外侮。

“七.七蘆溝橋事變”：1937年7月7日，日軍藉口「演習」時一名士兵失蹤，向北平西南的宛平城和蘆溝橋發動突襲，中國將士守土有責，奮勇還擊，中華民族全面抗日戰爭展開。

1937年8月20日，共產黨中央軍委同國民黨達成協議，在陝甘寧地區的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為八路軍，朱德為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1937年8月20日，共產黨中央軍委同國民黨達成協議，在陝甘寧地區的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為八路軍，朱德為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1937年10月，淞滬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軍委根據同國民黨的協議，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統一整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

成立香港八路軍辦事處：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成立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廖承志為該辦事處負責人。辦事處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開設一家「粵華公司」茶葉商行作為掩護，而商號後樓就是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八路軍辦事處有三項任務：

- 一：向海外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主張和政策；
- 二：把海外華僑的和各國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資送到各抗日根據地；
- 三：搜集國際最新動態情況供中共中央領導人參考。

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日寇全面侵華，血脈相連的香港同胞沒有坐視，摩總會長楊績、陳文漢於1938年發起募捐，支持抗日，購入一輛救護車及醫療用品，由黃光明等30多名摩總司機做先頭「護駕部隊」，用船運到湛江後，轉入越南再駛至廣西。1939年1月，安全送交給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接收，資料記載這部摩總送贈的救護車，其後轉送到延安。

1939年3月11日清晨，港英當局政治部突襲查封「粵華公司」，逮捕了連貫等五人，搜走了大量通訊名單的文檔資料。為此，周恩來在重慶與英國大使交涉，廖承志親至港英警署保釋，3月15日連貫等人獲釋，同時歸還了被搜走的文件。事後，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汲取教訓，不再設半公開的辦公場所，化整為零，轉入地下秘密狀態。

1938年4月中共成立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常委薛尚實、梁廣、林平（兼軍委書記）。

1938年10月12日，日軍第十八師團、第一零四師團和及川先遣支隊，分三路在廣東省惠陽縣大亞灣登陸，21日佔領廣州。10月30日，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曾生遵照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的指示，在坪山羊母嶂村召開臨時工作組擴大會議，成立中共惠

(陽)、寶(安)工作委員會，曾生任書記。會議確定組建惠寶邊人民抗日游擊隊，有 30 多人槍，並爭取到國民黨軍旅長溫淑海給予“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的番號。

10 月 30 日，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曾生遵照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的指示，在坪山羊母嶂村召開臨時工作組擴大會議，成立中共惠(陽)、寶(安)工作委員會，曾生任書記。會議確定組建惠寶邊人民抗日游擊隊，有 30 多人槍，並爭取到國民黨軍旅長溫淑海給予“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的番號。

成立“東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1940 年 9 月中旬 中共前東特委在布吉鄉上下坪村，由林平主持召開部隊幹部會議，決定拋棄國民黨原先給的“新編大隊”、“第二大隊”的番號。部隊番號改稱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整編為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第三大隊由曾生任大隊長，第五大隊由王作堯任大隊長，林平任兩大隊政治委員，梁鴻鈞任軍事指揮，確定在東惠寶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抗日游擊戰爭。

11 月 23 日，日軍對滯留在廣九線兩側的國民黨軍進行回師“掃蕩”，國民黨軍數千人逃向深圳沙頭角邊境，被英軍繳械，瓦解潰散。12 月 2 日，曾生、周伯明率領 100 多人的隊伍，在惠陽縣秋長鄉周田村成立“東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總隊長曾生，政治委員周伯明，副總隊長兼參謀長鄭晉。

12 月下旬 王作堯率領東莞模範壯丁隊 40 多人與黃木芬第一大隊會合，於 1939 年元旦重組“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王作堯任大隊長，何與成任政訓員，黃高揚任總支書記。12 月 25、26 日，日軍先後佔領南頭、深圳和沙頭角。1938 年廣州失陷後，香港隨即處於日軍的武力威脅下。

鑑於當時香港的防衛力量只有 4 營步兵，若干支援炮及香港義勇軍，兩營共約二千人的加拿大兵於 1941 年末到香港增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略香港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同時對馬來亞、新加坡、印尼、緬甸和菲律賓等地發動攻擊。繼偷襲珍珠港後，日軍飛機於 1941 年 12 月 8 日上午突襲啟德機場，駐守香港的英國皇家空軍猝不及防，慘被擊潰。在取得制空權後，日軍橫渡深圳河，長驅直入新界，抵達城門碉堡。12 月 9 日，日本陸軍第 23 軍 38 師 228 聯隊第 3 大隊突襲醉酒灣防線西翼防線的城門陣地，11 日英軍失守，日軍進佔九龍。12 月 12 日，日軍抵達鯉魚門。在日軍的進迫下，當時駐英軍司令莫德庇少將下令守軍經九龍退至香港。往後幾天，日軍曾兩次派軍使到港島招降，均被督楊慕琦斷然拒絕。

12 月 18 日晚上日軍從北角、鯪魚涌及筲箕灣三處登陸港島，繼而迅速佔據了柏架山及畢拿山，並逕向渣甸山和黃泥涌峽推進。在短短數日間，轟高信山及金馬倫山相繼落入日

軍手中。香港守軍雖曾發動多次反攻，但均未能成功。莫德庇少將有見及此，遂會見港督，表示已無力挽狂瀾。1941年12月25日聖誕日下午，港督楊慕琦接受莫德庇少將的建議，向日軍投降，戰鬥至此結束。

武工隊進入新界：早在1941年12月7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來急電指示：迅速做好應變措施，將轉移到香港的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撤出來，經澳門、廣州灣或東江游擊區轉去大後方。

12月8日 廖承志接到周恩來7日急電後，上午立即召集文化界、新聞界參加緊急會議，佈置應變工作，下午又分批會見民主黨派負責人、文化界知名人士，徵求對撤退方案的意見，決定撤退時各小組負責人聯絡地點，並分發隱蔽和撤退時的必需經費。12月9日，第五大隊副大隊長周伯明率領一支短槍隊，另派曾鴻文帶助手鍾英，尾隨日軍插入新界、元朗、大埔地區展開活動，隨後組成一支武工隊。

12月10日，第五大隊已經到達新界南涌。12月11日，第三大隊派出馬鞍山抗日自衛隊，在劉培、江水的率領下，進入西貢半島；曾生的第三大隊，抽調20餘人的小分隊，並在惠陽的小分隊抽調劉錦進（劉黑仔）等10人，也進入西貢半島。三支小分隊組成一個武工隊，由黃冠芳任隊長，劉黑仔任副隊長，在西貢地區及啟德機場附近活動，一直伸展到獅子山、慈雲山、牛池灣一帶。

武工隊進入新界後，主要執行三項任務：清除了橫行當地的土匪，收集英軍撤退時遺棄的武器，組織農民自衛隊，建立抗日游擊基地，設置搶救文化人和愛國民主人士撤退時的東、西兩條交通線。

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後，立即封鎖香港至九龍的海上交通，實行宵禁，並分區分段展開搜查，大肆搜捕愛國人士和抗日份子。同時還貼出告示，限令在港的知名文化界人士前往“大日本軍道部”或“地方行政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這批進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在抗戰爆發後就同中國共產黨一起，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因而難以在國民黨統治地區立足，而由中共安排到香港來。來到香港以後，他們利用香港的特殊環境，繼續以各種方式開抗日救國宣傳。他們的愛國舉動和抗日主張、進步言論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極端仇恨，他們當中多人早已被列入了黑名單，成為追緝捕殺的對象。

而另一方面，日軍又想利用這些文化界人士出來為日本侵略者說好說話，為他們粉飾昇平。

1942年1月元旦，營救文化人工作開始了。因為營救對象全部被困在香港島，難度很大。從港島到東江游擊區，有兩條路線：

東線，從九龍市區經牛池灣過九龍坳到西貢，然後在企嶺下或深涌乘船渡過大鵬灣，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沙魚涌等地方登陸，轉入惠陽地區游擊根據地的水上交通線，由黃冠芳、蔡國梁、劉黑仔、江水率領；

西線，在九龍市區步行經青山道，過九華徑到荃灣，再過大帽山到達元朗十八鄉，然後渡深圳河入梅林坳，到白石龍游擊根據地的陸上交通線，由曾鴻文、林沖、高平生負責。

另外一些文化人和愛國人士，因為在香港逗留時間長，容易暴露身份，或因年老體弱，不適宜攀山涉水，就另外安排從香港偷渡到長洲，再過澳門轉內地。

1月1日廖承志、連貫、喬冠華等在潘柱、李健行護送下從西貢乘船撤離香港，3日到達深圳坪山。廣東人民游擊隊和香港地下黨及廣東其它地區的黨組織，經過6個多月工作，克服種種困難，勝利地從港九地區營救文化界精英和愛國民主人士300餘人及其他人士共800餘人安全脫險，轉送到大後方。

成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42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寶安縣陽台山白石龍村主持一系列會議，決定加強和統一東江地區和珠江三角州敵後游擊隊的領導，成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總隊長梁鴻鈞，政治委員林平，副總隊長曾生，副總隊長兼參謀長王作堯，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楊康華，副主任李東。總隊下成立一個主力大隊和四個地方大隊，即在原第五大隊的基礎上成立主力大隊，東莞地方部隊仍為第三大隊，惠陽地區部隊編為惠陽大隊，寶安地方部隊編為寶安大隊。

會議決定，原先由第三、第五兩個大隊派進港九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幾支武工隊統一成立港九大隊，委派蔡國梁任大隊長，陳達明任政委，黃高陽任政訓室主任，副大隊長魯風，港九大隊初期設有長槍隊和短槍隊，壯大後為方便指揮，按地區分為西貢、沙頭角、元朗、大嶼山、市區、海上，共六個中隊。

成立“港九獨立大隊”：42年2月初，搶救文化人工作已告一段落，香港的抗日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2月3日陳達明帶著總部政委林平，總隊長梁鴻鈞、副總隊長曾生的命令來到西貢，在黃毛應村的天主教堂內與蔡國梁、黃高陽開了個三人會議，傳達上級指示，成立港九大隊，把原來陸續進入“新界”的隊伍統一起來，揭開了港九大隊的第一頁。

港九大隊成立初期是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下面五個大隊之一。大隊長蔡國樑，副大隊長魯風，政訓室主任黃高揚。大隊下設長槍隊，隊長卓覺民；海上隊隊長陳志賢，短槍隊又組成4支短槍分隊，沙田短槍隊隊長黃冠芳，副隊長劉黑仔；坑口短槍隊隊長江水；沙頭角

短隊隊長盧進喜；上水短槍隊隊長林沖。3月，大規模的營救工作已告一段落，港九大隊已告成立，

基於戰略上考慮，大隊決定擴大護航小隊為海上游擊隊，開展海上游擊戰爭，並選定西貢糧船灣為基地，代號順風隊，由陳志賢任隊長。海上游擊隊進駐糧船灣後，有兩項任務：監視敵人海上運輸線，伺機進行襲擊；保護客商往來。到了1943年6月，海上游擊隊發展到近百人，正式成立海上中隊，代號改為大華隊，新成立的海上中隊從糧船灣擴大到深圳的大鵬灣。

成立國際工作組：42年3月，港九大隊成立國際工作組，組長黃作梅，負責進一步營救被囚盟軍和國際友人。1945年9月，日本投降。黃作梅按照黨組織的要求，重返香港，籌備東江縱隊駐港辦事處，後任辦事處主任。1947年2月，因戰時與盟軍合作對日作戰的貢獻，黃作梅受英王喬治六世的邀請，到倫敦參加勝利大遊行，並被授予勳章。1947年6月，黃作梅任新華社倫敦分社社長。新中國建立後，黃作梅先後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共香港工委負責人和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組長。

1955年4月，隨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印尼採訪亞非會議。4月11日，黃作梅等乘坐的“喀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炸毀。黃作梅為了世界和平事業壯烈犧牲，年僅39歲。同機的8位新華社的記者亦同時犧牲。

日軍侵佔香港後，把英國戰俘囚禁於七姐妹、深水埗、亞皆老街三個集中營；把港英政府的文員、英國僑民包括婦孺等囚禁於赤柱集中營；把印度籍官兵囚禁於馬頭圍集中營；只有部份管理市政衛生的官員和銀行職員沒有被囚禁。

東江縱隊在營救文化人的同時，展開營救英軍人員和國際友人的工作。英軍戰地醫院的賴特上校、香港警司湯姆遜和波利斯屈特夫人、英國海軍軍官摩利遜上尉、戴維斯中尉、道格拉斯中尉、夏斯特中尉、湯姆生中尉、英軍陸軍軍官祈德尊中尉、懷特中尉、香港義勇軍的波生吉、英軍士兵霍友司、格爾拉夏等，他們在東江游擊隊的幫助下，脫離險境，到達東江抗日游擊根據地，然後被轉送到大後方。5月，英軍在廣東曲江成立「英軍服務團」。1942年1月，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香港義勇軍陸軍中校賴廉士在東江縱隊成員協助下，由深水埗集中營逃至中國內地，並於1942年5月在廣東曲江成立英軍服務團，數月後遷往廣西桂林。

7月，在惠州設立英軍服務團前方辦事處，中共中央同意東江人民游擊隊給予協助。辦事處主任是祈德尊少校，他亦是在香港淪陷後被由游擊隊營救出險。英軍服務團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營救戰俘和搜集情報，得到港九大隊的援助。

9月25日 大隊日軍包圍烏蛟騰村，強迫群眾交出自衛武器和供出游擊隊員，村長李世藩、李培源挺身而出，不怕灌水，不怕毒打，李世藩暈了又醒，醒了又暈，已經不能說話，只是搖頭，終於壯烈犧牲了。日軍頭目無法在李世藩口中取得任何消息，又將另一位村長李源培押到溪澗邊，灌水拷打，燒煙灼背，馬蹄踏腹等慘無人道的酷刑，李源培堅貞不屈，不肯作供。烏蛟騰村有李世藩、李憲新、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偉文、王官保、王志英、李源培等烈士，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因參加抗日工作而壯烈犧牲。1951年10月在烏蛟騰一處山坡下建成「抗日英烈紀念碑」。紀念上述九位烏蛟騰村抗日烈士。紀念碑曾於1985年10月進行重修。2009年12月選於現址重建，並於2010年9月落成。

烏蛟騰會議：1943年2月下旬 烏蛟騰會議召開。1942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和廣東省粵北省委被破壞，為了重建新的機構來領導廣東省的黨組織和抗日武裝鬥爭，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廣東省委臨時委員會和東江軍政委員會，1943年2月下旬在新界沙頭角區烏蛟騰村召開會議。

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和鬥爭的需要，黨中央指示把廣東人民游擊總隊的番號，改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東江縱隊)，下轄7個大隊，共3,000餘人曾生任司令員，林平任政委，王作堯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楊康華任政治部主任。公開發表成立宣言和領導人的就職電，宣佈我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部隊。

土洋會議，成立“東江縱隊”：1943年12月2日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在惠陽縣土洋村正式宣佈成立。1944年8月，港九大隊改為港九大隊(獨立第一大隊)，直接歸司令部領導。是年冬，部隊整編，改由第二支隊領導，恢復港九大隊名稱。以後，江南指揮部成立，隸屬江南指揮部領導。日本投降前後，又恢復了港九獨立大隊的名稱，復歸司令部領導。

日佔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奮勇抗敵。1943年5月某夜，港九大隊大嶼山中隊長劉春祥帶領六名班排骨幹，自東涌揚帆往龍鼓灘，冀建立新的游擊區。船行至龍鼓洲、沙洲海域，突遭兩艘日軍炮艇伏擊。劉春祥等臨危不懼，英勇應戰，激烈戰鬥至船被擊沉。

1989年出版的《港九獨立大隊史》對龍鼓洲和沙洲遭遇戰有以下記載：「1943年5月的一個晚上，中隊長劉春祥帶領11名班排級骨幹從東涌出發，駕駛帆船向龍鼓灘進發，準備消滅出沒在那一帶的土匪武裝，控制龍鼓灘。夜黑沉沉的，船駛至龍鼓、沙洲兩個荒無人煙的小島附近的海面時，突然有密集的火力襲來。原來有兩艘日軍炮艇潛伏在那裏。劉春祥等英勇應戰，由於敵我力量過於懸殊，12名指戰員在激烈的戰鬥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最後船也被打沉了，只剩下掌舵的女船工泅水回來報信。」另外數本書籍也有記載該次事

件，但記述的犧牲人數略有出入。據此估計，《港九獨立大隊史》記述的女船工，應該是船家梁克的妻子，在泅水報信後不久去世了，因此被列入犧牲者名單。

2020年9月2日，劉春祥等英烈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退役軍人事務部所公佈的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中的英雄群體名單，被稱為「劉春祥等十二名龍鼓洲戰鬥犧牲英烈」。香港特區政府於1998年10月28日公佈的「為保衛香港而捐軀之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名單」中，載有劉春祥（中隊長）、曾可送（排長）、林容（班級）、汪送（班級）、譚金火（班級）、溫發（班級）、劉佳（班級）、船家梁克等與此次戰鬥有關的人的名字。但有五名指戰員不知姓名，並且未被列入烈士名單，令人不解。

2021年3月，港九大隊後人黃俊康先生通過網上拍賣，購得原大嶼山中隊指導員王江濤書信，其中有一份1998年由李有等老戰士查訪、王江濤整理的「東縱港九獨立大隊大嶼山獨立中隊烈士名單」，至此真相大白。名單明確記載此次戰鬥犧牲者包括劉春祥、曾可送、林容、汪送、譚金火、溫發、劉佳等指戰員，以及船家梁克夫婦和一子兩女全家，合計12人。

1944年2月11日 美國第14航空隊飛行指揮兼教官敦納爾.W.克爾以二十架飛戰鬥機保衛十二架轟炸機，從桂林飛襲香港，在香港領空與敵機空戰，率領20架戰鬥機護衛12架轟炸機襲擊香港啟德機場，在香港上空與日機交戰，機群曾經擊落三架敵機。當時克爾指揮一小隊轟炸啟德機場，一時疏於防禦，被敵機突然側擊油箱起火，且燒傷面部、足部數處。

克爾後來回憶說，“當時急跳傘下降，在離地面不遠的空中俯視機場。太子道，許多人在拍掌歡呼。機場旁邊的敵兵在奔走著，一切都清清楚楚，一切都完了。我絕望地把手臂蒙住自己的眼睛，不敢再看下面，也不敢再想下去。還想甚麼呢，不是幾分鐘內就完結嗎？出乎意料之外，風向把我送到新界某地降下，我也知道此地離機場不過一山之隔，敵人立即就會來將我捕捉的，但還是向前奔跑。突然一個小童碰上來我，用手勢招呼我，他在前面跑，我跟著他跑，我知道敵兵已經追來了，但那個小童很迅速很勇敢機警而又靈敏，他對於那些山頭山坑的每一個小角落，都十分熟悉，他帶著我跑了幾個山頭，在一個小角落中隱蔽起來。”

當時日軍出動了1,000人，重重包圍了觀音山，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所屬各游擊中隊主動出擊，要從日軍重重包圍之中，解救出盟軍飛行員。李石，沙田牛皮沙村人，時任東縱港九大隊交通員。

克爾回憶說：“敵兵已在四面八方進行搜索了，他（李石）跑出去連絡便和我們分散了。在驚濤駭浪中過了一天，那天晚上他才回來找到我，並和一位女同志送來了食物和棉被到

來。“在那些日子裡，每當夕陽西下，黃昏的美景浮上天際時，我就感到敵人的搜索就停止了。在一個黑漆漆的夜，敵人還沒有撤退，但情形已經鬆馳許多，我才被你們神勇的同志黑仔保護到另外一個地方。

日軍圍困了觀音山 17 天，而克爾一行人則在山洞呆了兩星期。1944 年 3 月 9 日，克爾被送到土洋東縱司令部。阿明，當年 12-13 歲，他的母親是東縱土洋司令部的朱醫生。1946 年朱醫生隨部隊北撤，阿明留在廣東，1947 年在粵北戰鬥中犧牲，時任警衛連班長。

克爾中尉被救的故事，他本人只跟兩個兒子講了一遍。在返回美國生活的戰爭老兵中，這會是很普遍的，很少人吹噓自己的經歷。可是，他的故事裡中美中人民之間的合作，卻給孫子們留下深刻印象。

5 月 26 日，美國第 14 航空隊的 5 個飛行員：勒夫哥中尉、拉忽萊爾中尉、沙克上士、康利上士和艾利斯上士，駕駛 417 號的 B-25 轟炸機在襲擊日本運輸船時，座機被擊中，他們跳傘落到大海里，東江縱隊護航大隊在大亞灣海面將他們救起，並安全轉送他們回到桂林的隊部。10 月 7 日 在華美軍情報組派人到東江縱隊要求合作，為盟軍搜集日軍在香港的情報，東江縱隊建立了一個特別情報部門，其中港九大隊為盟軍提供情報進行了大量工作，測繪西貢、沙頭角、沙田、大埔等地地圖；整理各中隊上報的資料向司令部匯報；派出隊員混入機場，測定日軍飛機停放位置及軍火庫位置，將日軍的軍事機關、油庫、船塢、軍艦進出港口的情况等，繪製成圖，上報司令部轉給盟軍。

1945 年 1 月 16 日，東江縱隊又救護了美國第 14 航空隊的飛行員尹根中尉和第三艦隊飛行員克利漢少尉。4 月，日軍以大於游擊隊數十倍兵力，出動海陸空三軍，掃蕩大嶼山的抗日部隊。當時港九大隊副大隊長魯風，因病在寶蓮寺療養，日軍包圍寶蓮寺，威迫當時寶蓮寺住持筏可交出魯風，以砍頭威脅，但筏可處之泰然，日軍不得逞。

6 月 12 日，港九大隊市區中隊長方蘭之母馮芝烈士被日軍以間諜罪槍斃。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此時以詹遜為首的舊港府官員，於 8 月 25 日宣佈成立臨時香港政府。8 月 30 日 英海軍少將夏愨抵港，9 月 1 日成立軍政府。

1945 年 9 月 9 日，在南京舉行中國戰區受降儀式，會場懸掛中，英，美，蘇四國國旗。1945 年 9 月 16 日，夏愨在中國代表潘國華少將，美軍代表威廉遜上校及加拿大軍代表凱士上校見證下，在港督府接受日軍投降。9 月 28 日，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奉命撤出港九新界，發表《撤退港九新界宣言》。

重慶談判，達成雙十協定：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為力爭和平民主，在重慶與國民黨舉行一次談判。1945 年 8 月 28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

主、團結的三大口號。8月26日向全黨發出通知，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到達重慶。經過四十二天談判，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署了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民黨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承認各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並允諾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但在軍隊和解放區這兩個問題上存在著嚴重分歧。

為了打破僵局，挫敗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共產黨以不損害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原則，作出了重大讓步。主動提出，人民軍隊可以縮為二十四或至少二十個師。並將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八個解放軍區的部隊，撤退到隴海路以北及蘇北和皖北解放區。

成立“粵贛湘邊縱隊”：12月，東江縱隊北撤後，以東縱復員戰士為骨幹，重新組建粵贛湘邊縱隊，司令員為林平。至1949年，該部隊人數發展為三萬八千餘人。

1947年4月12日，英軍李治將軍到西貢頒贈「忠勇誠愛」的錦旗與西貢村民。港九大隊在西貢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幫助下，援救很多英美盟軍和國際友人脫險，殲滅大量日寇，為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1984年9月，當年東江縱隊總司令曾生訪美加後途經香港，到達西貢與隊員會面，到達爛泥灣、黃石及北潭坳等戰時據點時，撫今追昔，不勝唏噓，提議建立烈士碑園。1988年3月，西貢斬竹灣烈士碑園動工，1989年1月23日揭幕。

香港回歸：直至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離任，前後經歷半個多世紀。港英政府對於在反法西斯戰爭期間，曾經配合盟軍英勇作戰、深入集中營營救英軍戰俘、長期支援英軍服務團進入香港建立情報系統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一直不承認他們的存在，不給予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

香港回歸中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1998年12月28日，在大會堂隆重舉行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名冊儀式，特別行政區長官董建華親自將115名烈士名冊安放在烈士紀念龕內。特區政府立法確認了港九獨立大隊的歷史地位，並依據太平洋戰爭撫恤條例，對烈士家屬、曾經負傷和被俘被虐待的隊員給予撫恤，在香港有永久居住權的隊員及家屬享受公務員的醫療待遇。